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孙 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孙竹遗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6.1

(内蒙)新登字 6 号

责任编辑:戴其芳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孙竹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9.85 插页:1 字数:236 千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1015-583-0/H·39

定价:20.00 元



作者遗照

孙竹，字家齐，笔名石夫、齐默，辽宁省彰武县人，1931年2月20日生于沈阳。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后调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1976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主持编著《青海省地名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民族语文杂志社常务副主编。1980年评为副研究员。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曾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应用地名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文字改革》、《语文建设》编委等职。代表作《蒙古语文集》、《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主编过《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语言调查研究讲座》等。

1995年7月23日病故，享年64岁。

目 次

前言.....	(2)
作者自序.....	(3)
陈乃雄序.....	(4)

从《民族语文》刊载的论文看中国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7)
略谈蒙古语文	(23)
论我国蒙古族语言	(30)
论蒙古族的文字	(40)
关于国内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划分问题	(46)
现代蒙古语标准音音系分析	(68)
现代蒙古语规范问题.....	(126)
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	(139)
蒙古语察哈尔方音与书面语语音的比较.....	(154)
论达斡尔族语言	
一兼谈达斡尔语与蒙古语的某些异同.....	(178)
东乡语实词及其形态	(231)
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的数范畴比较.....	(256)
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词汇五百例.....	(271)
促进蒙古学的发展,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300)
附:孙竹论著目录	(309)

目 次

前言·····	(2)
作者自序·····	(3)
陈乃雄序·····	(4)
从《民族语文》刊载的论文看中国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7)
略谈蒙古语文·····	(23)
论我国蒙古族语言·····	(30)
论蒙古族的文字·····	(40)
关于国内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划分问题·····	(46)
现代蒙古语标准音音系分析·····	(68)
现代蒙古语规范问题·····	(126)
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	(139)
蒙古语察哈尔方音与书面语语音的比较·····	(154)
论达斡尔族语言	
一兼谈达斡尔语与蒙古语的某些异同·····	(178)
东乡语实词及其形态·····	(231)
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的数范畴比较·····	(256)
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词汇五百例·····	(271)
促进蒙古学的发展,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300)
附:孙竹论著目录·····	(309)

前 言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父爱，当我极度的悲哀之际，忽想起先父还有未竟之业，那就是近年来他一直想出版一本自己毕生从事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论文集。在病后初愈之时，他还惦念着此事，本以为能战胜病魔，重新拿起相伴一生的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之笔，但事与愿违，没想到他为此书匆匆留下的《自序》竟给他一生的研究事业画上了句号！

先父献身于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把最宝贵的年华洒给了塞外草原。他爱内蒙古大草原，他爱草原上的蒙古族兄妹；他更爱蒙古族语言，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只可叹，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可怕的现实，至今使我难以接受。多少个难眠之夜，我仿佛看到他偎依书案，凝神思索的背影；多少次恶梦惊魂，我似乎看到他仍在查阅资料，修改文章。仰望星空，回眸斗室，我看到的只是空空如也的写字台和那支伴随先父多年的旧钢笔。

父亲走了，确实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而坦然，因为他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离开了我，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伴随着我，教我做人，励我奋进。我永远铭记他用一生人品、文品凝结的教诲：正直、坦诚、奋斗。

爸爸，您的学术著作，作为您毕生心血浇灌的硕果，留给了我们以永久的纪念，丰富了蒙古语学研究。您的女儿已努力让它出版传世。您安息吧，爸爸！

孙懿

1995. 12. 23

作者自序

在我大病初愈之后,浏览了过去发表的这些文章,感到很欣慰。窃以为这些文章尚可自成系统,水平也还可以。因为我不可能再查阅更多更翔实的资料去排比分析;我的精力和时间也不允许做更加系统的深入研究了。即使我现在写,也不一定超过其中有的文章的学术水平。因此,把自己这组文章重加整理,奉献给读者,供大家研究讨论,共同促进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

作者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于北京昌运宫

陈乃雄序

孙竹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1952年我们从中央民族学院一起被送到北京大学学习蒙古语文，1956年一起毕业，又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任职。1959年我调到内蒙古大学工作，两年后，孙竹也来到呼和浩特，开始了他十五度春秋的塞外生活。1976年，他调回北京。自那以后，虽然天各一方，但是由于同窗的手足情谊，加上同行的工作联系，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共同切磋，互相勉励。孰料今年春节，传来他因病住院的消息，未及半载，竟然不治亡故，闻讯之下，先是惊愕，继以悲恸。正当解除了一切行政上的琐事，可以利用退休的时光，集中积累的经验 and 旺盛的精力，发挥余热，潜心著述之际，却过早地辞世仙游而去，怎不叫人扼腕太息，心碎肠断。

孙竹一生从事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五十年代后期，他深入内蒙古和黑龙江调查科尔沁蒙古话和库伦蒙古话，又赴甘肃调查东乡族语言，向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交了题为《东乡族语言文字问题》的论文。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他两次调查察哈尔和巴林蒙古话。1963年发表的《现代蒙古语规范问题》是探讨我国蒙古语规范化的最早的几篇论文中的一篇，尽管以“正巴土语”为规范标准的主张已成历史，这篇文章本身却至今不失其参考价值。担任《民族语文》杂志副主编的职务之后，虽然大部分心血化在

了范围更加广阔,责任更加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和组稿、审稿、改稿、发稿等繁杂的编辑工作以及培植少数民族本民族撰稿人的工作上,但他还是始终没有中断过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写出了诸如《关于国内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划分问题》、《论达斡尔族语言》、《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等高水平的文章。

孙竹的论著从实际出发,不拘众说,提出自己的见解,观点鲜明,富有新意。例如:他从语音学理论上提出进行语音规范的三项原则:第一、在标准音点的基础上考虑到各方言土语,互相参照,确立语音标准;第二、有悠久历史文字的语言在语音规范时,应适当兼顾与书面语读音尽可能取得的一致;第三、所确立的标准以易于人们接受使用为原则,用各地口语的普遍性加以衡量,有普遍性则取,没有普遍性则舍。他认为蒙古语的弱化元音不是各种短元音的变体,而是中性的特定音位;蒙古语的重音不是乐音性重音,而是通过呼气方式产生的动力重音。与大多学者把我国蒙古语划分为三个方言不同,他提出二分法,即内蒙古方言和卫拉特方言,而把几乎已成定论的巴尔虎布利亚特方言视作内蒙古方言的次方言。他又提出达斡尔语没有方言差别,只能划分为三个土语,这也是与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达斡尔语划分为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方言的处理方法很不相同的。诸如此类的观点,都辅以丰富的例证和深入的分析。所以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孙竹的研究对象,不止是蒙古语族语言,还涉及北方和南方的其他语言文字。这是与他献身于《民族语文》的审编工作密切相关的。在他担任《民族语文》常务副主编期间,他走遍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调查研究当地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况,扶植本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文章的撰稿人,提出一些有利于民族语文发展的意见。他写过许多阐发民族语文政策的通论性文章,发表在《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可以说,在我国民族语文事业上,孙竹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贡献是巨大的。除此之外,孙竹的研究领

域还涉及地名学这门新兴学科。《几个重要山水名称的考实和黄河河源问题》根据实地调查,把存疑近百年的青海、新疆交界处高7720米大山的名称“莫诺马哈皇冠峰”订正为“布喀达坂峰”,清除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名称;协助青海省组织考察组赴河源考察扎陵、鄂陵两大湖的藏语名称和正确位置,把地图上颠倒了二十多年的这两个湖的名称对调过来,介绍了黄河河源的考察结论;等等。这些成果都收到了积极的反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本书收录的论文范围限于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所以对孙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这个集子里没有反映出来。只能在这里轻轻地提上一笔。

孙竹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坦诚,一生奋斗,为蒙古语族语言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时间如流水,转眼之间孙竹先生去世已半年了。承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此文集。其夫人梁鸿文,子女书真、一石、懿嘱我操办其事并为此书作序。我有感于孙竹为促进蒙古语文和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不遗余力地探索语言学新理论、新方法,开拓新课题、新领域的那种孜孜不倦,鞠躬尽瘁,伏案笔耕直至最后一息的崇高奉献精神,在文集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写下这么几句话,以表示对知交故友孙竹学兄的敬佩缅怀之情。

本集所收文章撰写时间有前有后,跨度较大,所用术语、所采音标相互之间或有不同;涉及的方言土语、地理区划亦或有变异,辑录时基本上一仍旧稿,不加改动,以存原貌。

陈乃雄

1995年12月

于内蒙古大学

从《民族语文》刊载的论文 看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民族语文杂志是专门刊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从1979年2月5日出版创刊号,到1990年底已经出版了66期,共发表论文711篇。其中蒙古语族方面的论文93篇,占总数的13%强。《民族语文》面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80种以上的语言、现行文字和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文字40余种,而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论文竟占所刊论文总数的13%强,这个数字本身表明研究力量的雄厚。一般地说,研究蒙古语族的文章内容充实、材料翔实可靠,有些论文包含着独到的见解,解决了重大疑难问题。在方法上有共时的描写,也有历时的论述。特别是语音研究、方言研究、古文字文献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和发展繁荣蒙古语族诸语言,关系到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活跃在蒙古语族语言科研战线上的,既有本民族的专家学者,如,清格尔泰、索德那木永荣、那顺巴雅尔、巴达荣嘎、照那斯图、道布、确精扎布、包祥、新特克、哈斯额尔敦、图力更、李克郁、拿木

* 1991年8月30日至9月3日内蒙古大学第二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西北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转载。

四来、恩·巴图等；又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专家学者，如陈乃雄、贾晞儒、郝苏民、刘照雄等。他们都为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的开拓、提高、培养人才和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就我的工作范围所接触的论著，从科研角度谈谈近 10 余年来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一、语音研究 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阐明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规律和重要的语音现象，是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清格尔泰《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音势结构》(1989. 1)^①，认为蒙古语族语言中有功能上可以类比的有规律的一些语音现象。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元音和谐律。元音和谐律虽然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个共同点，但其具体内容在各个语言中都有些不同。如在蒙古语中元音和谐包括：(1)求同性(前后音节的元音之间)；(2)限制性(一个词里能共处的元音范围)；(3)序列性(允许甲—乙元音的序列，而不允许乙—甲元音的序列)；(4)制约性(独立元音决定依附元音)等内容。^② 在这些规律制约下形成的某一元音，尤其是依附元音没有多大的区别词义的功能，只是由于语音学的功能而有存在价值。而该文探讨的音势结构，实际上是辅音的配置规律，与 1983 年探讨元音和谐的论文构成姊妹篇。文中讨论了蒙古语族语言的辅音根据发音时气流的强弱程度分为三类：强辅音(如 p、t、k)，中辅音(如 b、d、g)，弱辅音(如 m、n、l)。在一个词里，第一音节首辅音和第二音节首辅音之间，在强弱的配置上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蒙古语族各语言和蒙古语各方言土语之间有所不同。这样就构成了各语言和方言之间的音势对应规律。如甲语言的“强辅音—中辅音”(如 k—d)对应于乙语言的“中辅音—强辅音”(如

① 括弧里的数字指发表在《民族语文》上哪一年、哪一期，下同。

② 详见清格尔泰《关于元音和谐律》，《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商务印书馆，1983，北京。

g—t)。音势结构是辅音间互相选择的规律。像巴林土语的 xatɬɛ “硬”、xət “城”、tat—“拉”、tjix “耳朵”；察哈尔土语分别是 gatɬɛ、got、dat、dɜix；土族语分别是 xaton、kudu、teda、teige，也就是说形成这样的对应公式：“强—强”：“中—强”：“强—中”。巴林土语代表的“强—强”型和察哈尔土语代表的“中—强”型涉及蒙古语各方言土语。土族语代表的“强—中”型涉及甘、青一带其他蒙古语族语言。音势结构的规律如同元音和谐律、辅音结合律一样，是语言的发展趋势、发音习惯逐渐演变的结果。它与具体的词义表达功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实践角度上说，违反这些规律，就会引起交际上的障碍；起码算不得地道的该语言或方言。文章最后引发出两个问题：（1）音势结构规律是很早就有的呢？还是后来发生的呢？或者是一部分很古，一部分比较新的呢？（2）古代书面语是有意回避矛盾，有意采取中立立场的呢？还是在古代这些音本来就分不清呢？清先生这篇论文对于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划分，对于语言的共时与历时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道布《蒙古语口语中的词首辅音弱化现象》（1981.1），综合分析各地口语材料，认为内蒙古方言中部地区（北纬 46°以南，东经 107°到 119°这个范围）的口语，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词首辅音弱化现象。位于词首的强辅音在一定条件下，被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较弱的辅音所替换，即：x, k, t, tʃ(～ts)→g, d, dʒ(～dz)。文章把弱化的条件归纳成两个公式，很有概括性，是解决了问题的。

刘照雄《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对应》（1984.6），从元音的对应、辅音的对应和语音的变化三个方面，对我国蒙古语族 6 种语言的语音进行了排比分析，共列出 36 项 121 栏，找出语音的主要对应规律和现象，下了一番功夫。语音对应关系可以用来证明亲属语言之间相关词语的语音面貌的相似，乃是有共同来源的各个语言系统平行发展的结果。它还可以用来证明那些表面上不很近似，但是词义对得上而且语音上的差异可以用语音对应关系来解释的

词语,实际上也是一致的。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的词汇、语法的共同性,必须通过语音形式来体现。如果词汇、语法上的共同性得不到语音对应关系的体现,那是很难被人接受的。此文还告诉我们,语音对应关系是说明亲属语言间存在亲缘关系的一种手段。

确精扎布《蒙古语察哈尔土语元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1989. 1),用语音实验仪器对察哈尔土语元音的音质和长度作了测定。把测定的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看法作比较,认为察哈尔土语中 Λ 的舌位相当靠前,3 是比[ə]稍开的央元音,第5 元音用[o]记比用[ɤ]准确;第6 元音 $\circ$ 是中高央元音;[u]是后元音;ε 是前元音;æ 准确一点应记为[æ̃]。据测定,察哈尔土语所理解的长元音与其物理上的长短不完全一致。同样条件下各元音的长短不同,同一元音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有很大的长短差异。确精扎布《从库库门恰克语与蒙古语元音比较看蒙古语语音史的一些问题》(1985. 2),从短元音、长元音、复合元音、元音和谐律等方面,进行库库门恰克语与蒙古语某些口语、蒙古书面语的比较分析,认为库库门恰克语的语音结构中不仅有古突厥语的特点,而且还保存着相当古的蒙古语的一些特点。此文对解决蒙古语语音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

道布《蒙古语的元音和谐与元音音位对立的中和》(1984. 2),运用音系学的原理,把音位理论的一些原则用到比音段音位更高的层次上,考察了蒙古语的元音和谐问题。通过分析蒙古语元音音位的高/低、前/后、圆/展、紧/松、长/短这样一些区别性特征,他认为元音和谐律是以松、紧二分法对立,在多音节词的后续音节里则又失去对立而形成对立中和。此文把互补分配原则应用到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研究上,用“超音位”解释了蒙文正字法。音位的对立中和,对于分析蒙古语的辅音系统也有理论意义。

就元音和谐律发表论文的还有:喻世长《元音和谐中的三足鼎立现象》(1981. 2),查干哈达《科尔沁土语元音和谐律的特点》

(1979. 4)和《再论科尔沁土语的元音和谐》(1981. 4),布和《东乡语的元音和谐现状探析》(1983. 4),仲素纯《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1980. 4)。

孙竹《蒙古语察哈尔方音与书面语语音的比较》(1983. 2)和《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1981. 1),清格尔泰《蒙古语塞音 q、k 的历史演变》(1985. 3),包力高《蒙古书面语元音间未脱落的辅音 x、g》(1985. 1),都是从共时或历时的比较研究中探讨问题的。道布《蒙古语中的吸气音》(1980. 1),文章虽短,却揭示了蒙古语口语中习以为常的吸气音所构成的几种叹词。

二、语法研究 从句子结构分析、某些语法范畴到某些词类以至构词附加成分的补遗,都有新的探索。道布《蒙古语句子结构分析》(1979. 2),把蒙古语的句子成分分为中心成分和扩展成分两大类。中心成分是谓语,扩展成分是状语、补语、主语。蒙古语的复句,从结构关系上分为 4 种基本类型:(1)并列复句,(2)偏正复句,(3)包孕复句,(4)引语复句。作者指出,蒙古语的句子一般是以谓语为支撑点建立起来的。谓语是蒙古语句子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谓语作为句子的结构中心决定整个句型。而扩展成分是同谓语相联系的,并在结构上受谓语的支配和制约。道布的谓语中心论,冲破了传统的句法理论,提出了一套新的分析方法。

确精扎布《〈元朝秘史〉语言的数范畴》(1983. 4),是利用计算机研究《元朝秘史》语言取得的成果。文章从《元朝秘史》语言的复数附加成分、关于《元朝秘史》语言数范畴的内涵、关于《元朝秘史》语言里的数的一致关系这三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既有翔实的例句又有数据,最后得出 5 点结论:1. 《元朝秘史》语言里有一 s、-t、-n、-nar/-ner、-nu'ut/-u'ut 等复数附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不仅接缀在名词之后,而且还可接缀在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后置词和一些动词之后。2. 与复数形式相对立的是不带有复数附加成分的上述各类词的词干形式,称为不定数形式。换言之,

上述各类词中存在着复数形式和不定数形式。3. 复数形式有三种语法功能：(1)表示纯复数意义(事物本身的多数)；(2)只表示数的一致关系；(3)表示构词意义。4. 不定数的形式，也有三种功能：(1)表示单数；(2)表示复数；(3)不表示任何数的概念。5. 《元朝秘史》语言里有不太严密的数的一致关系。此文对中世纪蒙古语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结论很有启发性。

孙竹《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的数范畴比较》(1987. 6)，焦其戴·吉仁尼格《蒙古语名词的单数形式》(1987. 2)，王鹏林《关于蒙古语族“格附加成分”的问题》(1983. 1)，拿木四来《达斡尔语的谓语人称范畴》(1981. 2)，恩和巴图《〈元朝秘史〉里的 ede 和 tede》(1987. 2)，那顺乌日图《中世纪蒙古语 a-、bū- 及其演变》(1990. 4)，贾曦儒《蒙古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分析》(1987. 2)和《蒙古语并列结构的语义关系》(1983. 4)，特图克《蒙古语并列复句分析》(1982. 1)和《蒙古语的状态词》(1980. 1)，查干哈达《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的形容词》(1982. 6)，斯钦朝克图《蒙古语巴林土语的递进副动词》(1990. 1)和《中世纪蒙古语里的副词 jiy-a》(1986. 1)，乐·色音额尔敦《同仁保安语的诸音合成词》(1982. 1)，葆录《关于蒙古语的某些构词后缀》(1981. 3)等论文，都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有的文章纠正了前人的谬误。

三、方言研究 方言是语言的地理分布。蒙古族各地的话大同小异，同多于异，语言的一致性很强。划分蒙古语的方言土语需要寻求语言的地方差异，并以地方差异为原则。^① 经过 50 年代对蒙古语的普查和后来的重点调查，对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有五分法、四分法、两分法，影响最大的是三分法。清格尔泰《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1979. 1—2)，对其过去的五分法做了修正，提出中国蒙古语应划分为三个方言。把卫拉特和巴尔虎布利亚特各作为一

^① 参见拙著《蒙古语文集》29—31 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